



[美] 罗威廉 著
鲁西奇 罗杜芳 译
马 钊 萧致治 审校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汉 口

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
(1796—1895)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美] 罗威廉 著
鲁西奇 罗杜芳 译
马 钊 萧致治 审校

汉口

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
(1796—189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美) 罗威廉著；鲁西奇，罗杜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9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ISBN 978-7-300-23262-1

I. ①汉… II. ①罗…②鲁…③罗… III. 城市史-武汉市-1796—1895 IV. ①K29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5734 号

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 (1796—1895)

[美] 罗威廉 著

鲁西奇 罗杜芳 译

马 钊 萧致治 审校

Hankou: Yi Ge Zhongguo Chengshi de Chongtu he Sheq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27.75 插页 2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40 000

定 价 7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言

本书是我开始于《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斯坦福：1984）的、关于19世纪汉口社会历史综合性研究的第二部分。撰写多卷本著述肯定会引发许多具体问题，尤其不可避免的是重复问题。本书总的原则是，尽可能避开在上部著作中已做过的描述与讨论——即使没有大段重复，两书篇幅也已经很长了。虽然大多数中国史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熟知我们的城市（指西方城市——译者）及其特点，但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乃是试图与研究西方早期现代中的城市化与社会的历史学家开展对话。因此，为了读者的方便，在此简要概括一下我此前研究的结论，也许是必要的。

汉口是长江的一个港口，其位置接近中国内地的地理中心，处在许多贯穿全国的主要长途运输线的交叉点上。这使它成为大清帝国国内区域间贸易中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贸易中心——我已经证明此种贸易的规模远比通常所想象的要大得多，这些因素在汉口城市社会的形成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口的人口，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超过100万；其来源非常庞杂，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非常遥远的异地他乡。数以百计的、依照籍贯和行业原则建立起来的行会公所将这些人口进一步组织起来。在行政上，汉口没有在清帝国体制下取得任何省、府和县级治所的地位；作为一个商业市镇，它隶于汉阳县的管辖之下——中等规模的汉阳县县城位于不易渡过的汉江的另一侧。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官僚统治薄弱，虽然汉口一地人口流动频繁，籍贯复杂，并带有狭隘的乡土意识，但在19世纪，汉口将事实上的城市自治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这种城市自治在日益正式化的、遍及整个城市的主要商业行会的联合过程中，逐步找到了制度化的表现方式。

与上部著作相比，本书较少关注汉口的商业贸易及其管理机制。本书在

承认行会具有重要社会政治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它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另一些正式与非正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上部著作考察的焦点是商业精英的世界，本书则拓展了视野，具体分析城市劳动阶级的所思所想及其行为。最为重要的是，本书尝试着去理解社会冲突的结构与进程，以及作为一个自发的、内聚性的社会单元的城市，是如何维持其自身并不断发展的。

在撰写两卷本著作的过程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何保持研究的连贯性。在两本书的撰写之间，新的原始材料不断发现，学术论文阅读面也逐渐扩大，必然会引导某些观点发生一些细微或不那么细微的变化。本书关注的焦点和研究重点与上部著作都有很大不同，但我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我的观点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首先，在上部著作中，我把研究的下限定在意义深远的地方工业化开始之时，可是现在，我认为地方工业化开始的时间不是在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并着手“自强运动”的1889年至1890年，而应是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时。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分期上的差别，但在本书的研究中却允许我们去分析许多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前期的汉口社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在本质上与其说是工业化进程的副产品，毋宁说是此前数十年间发展趋势的延续。

其次，在本书的讨论中，与我上部著作中强调汉口与本区域社会的联系程度不高的观点不同，本书事实上更注意讨论汉口与其紧邻腹地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当然，这仅仅是程度上而不是类别上的差异。我仍然坚持认为，与大多数中国城市相比，汉口与其周围乡村的联系明显地要弱得多（它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面向全国范围内的贸易），可是比之于19世纪前半期，这种联系在本世纪后半期有所加强；就整个19世纪而言，这种联系都没有随后而至的工业化时期密切——那时，汉口开始系统地从它的腹地攫取工业原材料、工厂工人和技术精英。

本书编入了以前发表的两篇论文的材料，当然在新获证据的基础上对这些论文做了重要修订。第八章关于“保甲”的部分是在我呈给《转变的中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79。由傅佛果 [Joshua A. Fogel] 和我主编的韦慕庭 [C. Martin Wilbur] 教授的退休纪念论文集）的一篇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我非常感谢西景出版社（Westview Press）允许我在这里重新使用这些材料。本书第九章是对我的另一篇论文《晚清城市中的叛乱及其敌人：1883

年汉口的叛乱阴谋》作了重要改写而成的，该文发表于邹说主编的《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集》第4辑（1979—1980）。我非常感谢在此之前国家人文科学基金和芝加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项目基金给予的资助，使我能够开始关于1883年事件的研究。

这里，我不再重复在上部著作中已经谈过的有关汉口研究的个人认识，尽管两本书起源于相同的早期研究工作，并且这些认识仍然在起作用。我必须再一次对几位朋友、老师和长期合作研究的同事表达我的感激之情——黎安友（Andy Nathan）、傅佛果、苏云峰、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萧致治和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以及我在上部著作中不慎遗漏的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海伦·塔特（Helen Tartar）。这项基础研究和以前一样，得到了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

我满怀敬意地对许多学者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他们尚未公开发表（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而表示感谢。他们的名字在本书注释中均一一注明了。这里，我想特别感谢玛丽·兰金（Mary Backus Rankin）和戴维·斯特兰德（David Strand），每一个熟悉他们主要著作的读者都会在我的观点中发现他们对我的明显影响。在霍普金斯大学，我非常感激给予我支持的连续三任历史系主任——马克·沃克（Mack Walker）、奥瑞斯特·兰姆（Orest Ranum）、约翰·鲁塞尔伍德（John Russell-Wood），以及贝蒂·威尔汀（Betty Whildin）和她优秀的职员们。以下几位阅读了全部或部分原稿并提出了有价值的评论意见：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理查德·戈德史沃特（Richard Goldthwaite）、康无为（Harold Kahn）、林恩·霍伦·利斯（Lynn Hollen Lees）、韩书瑞（Susan Naquin）、玛丽·兰金、戴维·斯特兰德和马克·沃克。当然，我并不是总能正确地认识到这些忠告是最好的。

最后，与上部著作一样，我将最深厚的感激留给我的妻子，J. A. 弗里德曼（Jill A. Friedman），感谢她专业的帮助和长期以来矢志不渝的鼓励与支持。在本书旷日持久的写作过程中，她和我的两个可爱的孩子自始至终都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谨以此书献给他们。

罗威廉（William T. Rowe）

中译本序

本书英文本出版于1989年，是我有关长江港口城市汉口研究的第二部著作。这一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那时，有关19世纪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英文著作十分罕见，而且很多人认为现存资料远不足以对这一论题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如今，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大量有关其他城市的研究著作纷至沓来。

这一具体实证的著作之所以引起非议，是因为它讨论了城市中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我使用这一概念，是受到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关于现代早期欧洲的研究以及玛丽·兰金、戴维·斯特兰德、肖邦齐（Keith Schoppa）等美国学者有关中国研究的影响。“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之类的概念是否适用于清代或民国时期的问题，已成为美国中国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定程度上，在中国也是如此。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学术泰斗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对玛丽·兰金、戴维·斯特兰德，特别是我本人将这些概念运用于有关他所认定的独裁专制王朝的研究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想，魏斐德以及其他批评我的学者，对“市民社会”作出的解释，比我自己的理解，要更宽广、全面一些；在本书中，我使用“公共领域”，只是为了阐释“公”这一范畴——实际上，在19世纪的史料中，这一语汇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在某种意义上，我试图由此再从根本上向前迈进一步，即如果不是出现了引发辛亥革命的适当条件，很难想象，像魏斐德所假设的那样典型的美国式民主会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实际上，地方社区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做许多事情，他们以地方“公共领域”的名义，创设了帝国政府认为没有必要或者只是负担并可以轻易减省的诸多设施。直到今天，我虽然对自己的意图受到误解而感到遗憾，但依然认为自己对汉口“公共领域”的描述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并对此感到满意。

然而，以今天的眼光看，本书有两个方面，我可能会进行不同处理。首先，我会更注意讨论 19 世纪汉口社会的性别，或者妇女的经历。本书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会安慰自己说：有关材料太过简略，不足以讨论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我想问题也许并不仅仅在于我不知道何处有系统叙述汉口妇女的材料。其次，我会更密切地关注汉口日常生活中暴力的存在。当然，本书对暴力冲突已作了大量探讨，但最主要的侧重点放在如何抑制或解决暴力冲突方面。考虑到已有的阐释模式均认为 19 世纪的中国城市是混乱的、难以管理的，我认为有必要着重强调城市居民是如何通过社区（community），以集体的力量去控制暴力的。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样做是重要的，只是我想我会花费更多的精力，试图去理解暴力活动产生的根源，以及司空见惯的暴力对城市居民生活的影响。

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曾有机会于 1981 年在武汉度过了约半年时间。我永远不会忘怀那些日月。如今，中国已经没有那样的城市。1981 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几年，集体化强制和计划经济的束缚虽已开始松动（对于汉口这种在很大程度上以商业为其存在基础的城市来说，关闭私营市场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但今日中国城市特有的狂热商业化尚未发端。社会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我又有机会几次重返武汉，对它的发展与繁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武汉居民的总体生活状况较之 1981 年已有了极大改善。实际上，虽然拥有“现代”新面貌，而商业经济繁荣的今日武汉，也许与 19 世纪作为中国最繁华河港城市的汉口更为相似。可是，我却情不自禁地更怀念我所熟悉的 1981 年那个静谧的城市。

2006 年 3 月，于巴尔的摩

目 录

绪论：现代化早期的中国城市 1

第一部分 城 市

第1章 市民 17

 一、城市心态和文化 19

 二、传媒与政治生活 25

 三、职业结构 33

 四、生产组织 44

 五、城市化移民 51

 六、阶级 58

 七、精英和社团意识 64

 八、结语 71

第2章 城市空间 73

 一、地产 74

 二、空间结构 80

 三、土地配置 84

 四、居住方式和街区结构 87

 五、活动中心 94

 六、结语 97

第二部分 社 区

第3章 大众福利 101

一、国家主导：救灾	102
二、国家主导：仓储	104
三、国家与社会共同主导：公益机构	110
四、社会主导：善堂体系	116
五、常规化的大众福利：粥厂与“冬防”	141
六、结语：城市社区的制度化	144
第4章 公共设施与公用事业	149
一、城市建设	150
二、防洪	160
三、防火与消防	174
四、公用事业	185
五、文化机构	191
六、结语：公共领域的兴起	201

第三部分 冲突

第5章 冲突的结构	207
一、犯罪和社会病态	208
二、群体纠纷	217
三、礼仪之争：龙舟赛	221
四、民众抗议	226
五、结语：冲突与社会整合	235
第6章 危险阶级与劳动阶级	238
一、地痞	239
二、退伍乡勇	243
三、难民和流浪汉	249
四、劳工帮伙	255
五、结语：19世纪汉口的“危险阶级”	268
第7章 忠实的信徒	271
一、造反者	271

二、民间秘密教派和会党	284
三、排外主义	300
四、结语：市民与外来者	308

第四部分 控 制

第8章 控制力量	313
一、驻防清军	313
二、自卫：城市团勇和汉口城墙	318
三、保甲	327
四、1876—1883年间内部安全之强化	337
五、结语：没有警察的治安	343
第9章 危机与应对	346
一、反叛者、动因和时机	348
二、密谋	356
三、参与者的地域来源及城市在危急时刻的反应	361
四、反叛乱动员的机制	364
五、总结和余论	371
结 语	376
主要参考文献	385
译后记	430

绪论：

现代化早期的中国城市

1883年5月初发生的一件事打破了汉口这个清帝国最重要的内地商业城市表面上的平静。一群躲藏在城市角落里的反叛者，在极端暴力理念的驱使下，准备发动一场不仅要推翻清王朝统治，而且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叛乱。这是一群有着佛教千年信仰的男女。他们在试图举事的前夜被政府发现，随之而来的是旷日持久的审讯，以及城市社会内部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在此之前，有关叛乱屠城的警告与市井谣言就已经使这个生机勃勃的、繁荣的港口城市骤然紧张起来，居民纷纷逃离。突然之间，汉口成为备受关注的异端力量的中心，呈现出严重的社会紧张局面。

汉口既有茶肆、诗社、龙舟赛，也有街头充满火药味的争吵；在夜晚，灯市与街角的打斗并存；街头有舒适的轿子，到处分布着“水龙”（一种手拖的消防机械）；散兵游勇和更夫走来走去，盐商、挑粪苦力、街头艺人和来自乡下的难民穿梭来往。这里一点都不平静。这个城市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社会关系极度紧张，人们的怨愤日积月累，逐渐增加，暴力成了家常便饭。暴力倾向几乎是出自每个人的天性，个人间的冲突甚至影响了直系亲属之间关系的和谐。尽管如此，在19世纪，汉口内部却引人注目地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公开对抗与冲突，直到1883年，最严重的社会破坏的威胁基本上都来自外部。在这个城市内部，普遍的印象正如旅行家胡克（Abbé Huc）神父所说的那样，“秩序与宁静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①。对于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人来说，汉口是非常典型的运转正常的社会单元。

对于1883年事件所包含的意义，有些解释可能在根本上是错误的。我们想起研究现代化早期巴黎的历史学家路易斯·夏维里尔（Louis Chevalier）的

^① 胡克：《中华帝国旅行记》（纽约：1859），第2卷，142页。

一段措辞谨慎的描述：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城市是繁荣而平静的，人们专心工作，生活节俭，一心想发财致富（而且相当成功）……人们喜欢遵照秩序办事、处理公务，生活习惯也都循规蹈矩，人人都遵守法律和规章？当然可以这样说，但如果我们的眼光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史与经济史的层面，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透过政府档案、警察每天的报告，甚至是报纸的小新闻，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更深的另一些层面——街道、作坊，以及每天都在发生的生活琐事……这个城市似乎生了病，它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长期挣扎在生死线上。^①

汉口的情形是否也是如此？它平静与繁荣的背后是否也掩盖着病态的社会问题？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官府和掩饰着普遍的冷淡甚至是反抗情绪的城市精英的一致支持？有效的“社区”界线是什么？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社会冲突会对城市社会甚至（如1883年那样）整个晚期帝国社会形成威胁？凡此，都是需要在本项研究中探讨的基本问题。

* * *

上文引用路易斯·夏维里尔的描述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它实际上显示出本书赖以建基的一个假设。尽管施坚雅及其同事们的不朽名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将研究步伐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有关中国城市化历史的研究仍相对落后，因此，当我在寻找有益的研究线索时，就自然而然地开始关注有关西方城市的研究成果。在里格利（E. A. Wrigley）、汤普森（E. P. Thompson）、乔治·路德（George Rudé）、德弗里斯（Jan de Vries）、夏维里尔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我发现了许多我所需要借鉴的一些睿智和阐述清晰的观点，也有一些我不曾留意的问题。我时常惊异地发现工业化时期或者此前的某些欧洲城市在许多方面与我所研究的19世纪的汉口很相似。一方面，我强烈地意识到试图将某一时代的中国社会简单地与另一时代（通常要早一些）的西方欧洲社会对应起来是危险的，也是不公正的。另一方面，我更相信那种认为中国历史发展属于“特例”的观点并无助于认识其历

^① 夏维里尔：《19世纪上半叶巴黎的劳工阶层与危险阶层》（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73），19页。

史的真实。我希望读者在审读了本书所提供的证据之后，能和我一样相信：考察 19 世纪的汉口与大约早一个世纪的西方城市之间的异同，是理解中华帝国晚期社会的一种有效途径，探讨其共同之处对于接近历史真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我认为在上述时期内的城市已经到达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发展阶段，问题是这一阶段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对许多西方城市（不仅是指欧洲，还包括更大范围的西方世界）在前工业革命的数百年里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的认识，使我们越来越怀疑“前工业化城市”存在着某种共同模式的非历史主义观点。^① 引起这些变化的根本动因是急剧增加的大众日常消费品的长途贸易，特别是大宗商品如粮食、木材及纺织原料交易量的增加。在西方，这一进程开始于中世纪晚期，在 16 世纪的海外扩张中变得更加显著。在中国，同样的进程大约开始于 11 世纪的宋代，而且在 16 世纪之后，明末清初，获得了更加迅猛的发展。^② 许多学者相信：在欧洲，在商业活动日益增强的后期，生产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是工业革命的直接前提，并且近来提出了一个“原初工业化”的概念，专门用来描述这一阶段及其城市社会的特征。^③ 熟悉原初工业化讨论的读者将会注意到他们所描述原初工业化的情况与我所研究的汉口之间，有许多基本的相似之处。尽管如此，由于我无法确定这些情况与随后发生的技术革命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至少是在中国），我在这里选择

① 有关这一观点，最著名的阐释是斯杰伯格（Gideon Sjoberg）的《前工业化城市》（纽约：1960）。斯杰伯格的观点当然也受到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的批评，特别切中要害的批评之一是指出其存在着偶然性：“殖民时代的拉美城市：是前工业化，还是资本主义？”

② 中国与欧洲一样，16 世纪经济变迁步伐的加速与美洲白银的输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参见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1972），435～450、457～508 页；阿特韦尔（William Atwell）：《金银的国际流动和中国经济，以 1530—1650 年为中心》，载《过去与现在》第 95 期（1982 年 5 月），68～90 页。

③ 参见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欧洲的城市化，1500—1800》（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84）；霍亨伯格（Paul Hohenberg）、利斯（Lynn Hollen Lees）：《都市化欧洲的形成，1000—1950》（坎布里奇：1985），第二部分。早期有关原初工业化的研究倾向于关注乡村地区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比较忽视城市。请参阅上揭著作，以及曼德斯（Franklin Mendels）：《原初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载《经济史研究》第 32 卷第 1 期（1972 年 3 月），241～261 页。

了较少争议而含义大致相同的另一个概念“现代早期”来指代这一时期。^①

那么，汉口与早期现代的欧洲城市有哪些共同点？它们的“现代性”存在于哪些方面？最根本的共同特点，如上所论，是在长途贸易的经营中充当“中心”的角色。更明确地说，这种新型城市的出现与作为文明社会之一部分的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密切相关。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长途贸易的发展导致地方生产专业化以便供应远方市场的需求——低地国家和江南的手工纺织品是最著名的但并不是唯一的例子。由于这些新的、地方性的、面向外销的产品实际上是在乡村或郊区生产的，诸如运输协调、估价和最后加工等许多职能，都势必在主要城市进行。^②这不仅改变了城乡关系的性质，也改变了城市自身的内部结构。伴随着大规模的机械化工厂企业集中出现在城市郊区，城市外貌发生了重大的、引人注目的变化（在欧洲始于1780年前后，在中国始于1895年前后），它又进一步引发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现代早期”阶段也即随之结束了。

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尽管很多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中心地都受到生产与长途贸易扩展的影响，但统计结果表明，受影响最显著的是政治中心和商业都市，亦即首府城市和高层级的港口城市。^③一些中心城市（其中包括欧洲的伦敦、巴黎和中国的汉口）尽管此时人口的增长尚无后期工业化引发的人口激增那样剧烈，但毫无疑问，此时人口增长的速度与幅度都是空前的。其结果是城市人口在族群与行业两方面都更加复杂，新来者与“过客”

① 罗溥洛（Paul Stanley Ropp）在《现代早期中国的异见言论：〈儒林外史〉与清朝讽刺文学早期现代》（安阿伯：1981）一书中最早试图用“现代早期”来描述清代的中國。最近，韩书瑞（Susan Naquin）与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在《18世纪的中国社会》（康涅狄格州，纽黑文：1987）一书中（232～236页）也运用了这一概念。这两部论著都没有认真地试图界定“现代早期”的内涵，尽管韩书瑞与罗友枝暗示其前提是在扩展中的长距离贸易（特别是洲际贸易）中发挥作用。

② 参见德弗里斯：《欧洲的城市化，1500—1800》，8页；霍亨伯格、利斯：《都市化欧洲的形成，1000—1950》，103、125页。

③ 对我的研究很不利的是：有关欧洲港口城市的研究论著比有关政治中心城市的研究少得多。下述两部著作在研究工业化时期欧洲最大的港口时，涉及现代早期时期的情况，可以参阅维吉尔（Frankcois Vigier）：《变化与冷漠：工业革命时期的利物浦与曼彻斯特》（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0）；瑟维尔（William H. Sewell）：《结构与流动：马塞的男人与女人们，1820—1870》（英国，剑桥：1985）。

(理查德·塞尼特 [Richard Sennett] 称之为“陌生人”) 不断增加, 人口构成普遍年轻化, 定居者更少, 而穷人所占的比重则空前提高。^①

这些由统计学得出的结论说明现代早期城市的阶级结构较之其前后均远为复杂而且不稳定。具体地说, 在生产关系与劳动组织方面, 重要的改变是以下列方式进行的: 纯粹的货币关系不仅控制着市场, 而且开始进入生产领域。尽管不同城市之间存在差异, 但在所有地方, 家庭生产体系都在一定程度上逐步被使用丧失财产的雇佣工人 (亦即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无产者) 的大规模企业所取代。^② 当然, 这一时期阶级意识的程度一般说来比在工业资本主义下要低一些 (当然, 也比在封建制度下要低), 行业与族群的垂直关系较之经济阶层更受到人们的重视。族群—行业团体仍然是划分城市居民的主要方法, 而且建立在这一原则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组织 (行会、同乡会与劳工帮会) 也仍然是城市最重要的组织性构件。^③

如果这些统计学与经济学上的特点可以用来界定现代早期城市特征的话, 那么, 汉口与欧洲城市在其可以比较的发展阶段也具有许多稍为次要但也密切相关的共同特点。例如: 在空间方面, 这些城市主要是依靠增加其居住密度 (自身内部扩容) 来容纳它日益增长的人口, 而不是依靠向新郊区的扩展 (在随后的工业化过程中则主要是这样)。邻里组织是强有力的, 但还没

① 参见里格利 (E. A. Wrigley): 《伦敦在变动的英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 1670—1750》, 载《过去与现在》第 37 期 (1967 年 7 月), 46~70 页; 夏维里尔: 《19 世纪上半叶巴黎的劳工阶层与危险阶层》; 塞尼特 (Richard Sennett): 《酒店老板之死》 (纽约: 1977), 49~51 页; 德弗里斯: 《欧洲的城市化, 1500—1800》, 71~76、141~148 页; 霍亨伯格、利斯: 《都市化欧洲的形成, 1000—1950》, 102、127~128 页。

② 在一些学者看来, 许多现代早期城市所发生的这种“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 已足以在本质上将它们界定为“资本主义城市”。尽管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制度的商业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的汉口已获得广泛的发展, 而且我们将证明它在城市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有广泛的影响, 但我仍然认为用内涵模糊而且复杂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去描述这个城市的特征, 显得太大了。希尔顿 (Rodney H. Hilton) 《资本主义——它是什么?》一文 (载《过去与现在》第 1 期, 1952 年 2 月, 32~43 页) 对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有着严肃冷静而简明扼要的讨论, 请参阅。

③ 关于现代早期时期欧洲的公共团体, 请参阅瑟维尔: 《法国的劳动与革命: 从旧制度到 1848 年间劳动语言的变化》 (英国, 剑桥: 1980), 第 2 章; 索利戴 (Gerald Lyman Soliday): 《冲突中的社区: 17 世纪与 18 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福社会》 (新罕布什尔州, 汉诺威: 1974)。

有集聚成为内部整合一致的社区或与更大范围的城市社会相对应的“亚社区”。许多人的住宅与工作场所仍然是连在一起的，比如形成典型的“家庭作坊”布局，尽管这种生产组织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变化之后已经显露出衰败的迹象。

城市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汉口是一个条件优越的天然市场（许多城市的商业活动仍然都是在露天进行），也是形形色色的人物娱乐的场所。行会、邻里和市政当局举办的不同级别的节庆活动都组织得很好，而且吸引了大批人群。伴随着口头传播和在公众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巨大的、日益重要角色的印刷媒介（包括已经发端的近代新闻业）的产生与发展，较为实用的读写能力日益普及并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作为一个整体，城市实际上相对独立于封建统治，它只要对自己和中央政府的管理部门负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欧，人们都不是那么明显地能感受到中央政府的存在，此时的政府宁愿采用一种谨慎的家长式的态度来对待城市社会问题，而不是采取完全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是那种经常伴随着工业化的足迹而来的、更为积极的干涉政策。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有组织的市民团体活动得到持续的发展，大范围的慈善机构，以及为应对那些前所未有的、现代早期城市又必须面对的具体城市社会问题而组织起来的公共服务机构，也不断孕育生长。

* * *

可是，即使汉口具备每一项西方现代早期城市所具有的基本的经济与社会特征，它的社会历史仍然至少在一个引人注意的方面显示出与西方城市的不同。现代早期化阶段的欧洲城市被普遍描述为暴乱与反抗活动的中心，理查德·考伯（Richard Cobb）、纳塔利·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埃利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里（Emmanuel LeRoy Ladurie）、乔治·路德（George Rudé）、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查尔斯·泰利（Chareles Tilly）等历史学家（这只是一些最著名的名字）曾从不同方面描绘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活动以及民众叛乱的详情。^① 以我的能力无

① 我仅仅建议阅读这些学者的著作。尽管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体系背景，但工业化前一段时期美洲大城市的骚乱也并不比与之相对应的西欧城市要少。请参阅费尔德贝格（Michael Felberg）：《动乱岁月：杰克逊时代美国人的骚动与混乱》（纽约：1980）；吉尔（Paul Gilje）：《走向群众专政之路》（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87）。